



海峡两岸暨香港人文社会科学论坛文集 (2014)

公平与发展

EQUITY AND DEVELOPMENT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海峡两岸暨香港人文社会科学论坛文集 (2014)

公平与发展

EQUITY AND DEVELOPMENT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平与发展：海峡两岸暨香港人文社会科学论坛文集：2014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

ISBN 978-7-5097-9415-9

I. ①公… II. ①中…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人文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7268 号

公平与发展

——海峡两岸暨香港人文社会科学论坛文集(2014)

主 编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孙 瑜 杜 敏 刘德顺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编辑部 (010) 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9.25 字 数：307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9415-9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央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基于协力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及交流合作，共同发起了“海峡两岸暨香港人文社会科学论坛”。此次论坛于2014年11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协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张妙清、台湾大学副校长张庆瑞、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台湾中央大学副校长刘振荣、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以及南京大学副校长杨忠分别在开幕式致辞。在开幕式上，七家主办单位共同签署了“海峡两岸暨香港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合作协议书”，协议书的签订将使海峡两岸暨香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缔结更紧密的联系，对凝聚海峡两岸暨香港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的智慧，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具有重要意义。

海峡两岸暨香港之间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不断拓展，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经济上互依互惠，文化上同根同源，社会交往的纽带丰富多样，使海峡两岸暨香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共通的感受和体会，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许多值得交流的重大议题。面对全球化和社会变迁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处理好公平与发展的关系，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共同探讨公平与发展的内涵与关联，相互交流看法和经验，彼此了解，实现海峡两岸暨香港共谋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共同的使命。

此次论坛的主题为“公平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张妙清教授和台湾大学朱敬一教授为本次论

坛发表主旨讲演，他们的讲演分别介绍了海峡两岸暨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平状况、公平的演进趋势，提供了视角不同但意涵深邃的关于公平与发展的分析框架。来自海峡两岸暨香港 80 多位专家学者就“公平与发展的内涵与关联”、“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与华人社会实现公平与发展”、“海峡两岸暨香港实现公平与发展经验的比较与启示”三个专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首先，对于公平与发展的理论思考，是不少学者的兴趣点。有 8 篇文章从理论的角度探讨公平与发展的问題。这些论文和报告或者从哲学或社会理论的高度探讨了公平与发展的内在关系（苑举正，杨祖汉，周怡），或者从华人社会的中华性观念出发探讨工业共赢发展的公平尺度（吴小安），或者从法律平等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客观发展，或者把公平的发展视为一种重要的人权来看待，认为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发展，公平的发展才是可能的（肖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研究似乎提供了一种关于公平与发展问题的理论思考的完整逻辑链条。

其次，关于海峡两岸暨香港公平与发展问题的经验研究，赵永佳、叶仲茵教授的论文“香港代际公平与发展”，侧重分析香港青年人群在教育、就业和工作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的十年变动趋势，并从职业教育相关公共政策的角度探寻促进香港代际公平的出路。朱敬一、康廷岳教授的论文研究了经济转型引发的台湾社会“不公平”问题，特别运用翔实数据分析了社会不公平的五个关键层面，即薪资冻涨、所得分配、居住正义、子女教育、阶级流动等五个方面的不公平，并分析了导致这些不公平的主要原因和机制。张玉芳、古允文的论文“经济成长之外：台湾包容性发展的挑战”，全面检视了台湾以往偏重经济成长的发展模式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一个有能的政府必须让经济成长转化为就业机会和薪资所得，同时对劳动市场中的边缘人口提供福利保障，从而应对挑战、提高包容性水平的政策主张。范从来、张中锦教授的论文“收入分配与公平发展的实现”从收入主要来源分布的不平等状况，也就是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分布不平等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研究了内地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形成机制，提出了相应的促进公平的政策主张。吴愈晓、黄超的报告“中国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城乡差异研究”，运用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在性别不平等的程度、变化趋势以及不平等来源等方面的差异，得出了

当前中国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传统性别角色差别对待观念是主要成因的发现。这在某个方面似乎也暗示着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并不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最后，关于公平与发展的政策探索。公平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政策问题。因此不难理解，在本次论坛上发表所有研究成果，其实都基于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公共政策层面的思考。在论文集当中，景天魁教授的研究和张妙清教授的研究，着重从社会政策的角度分析社会公平的政策导向问题。景天魁教授的论文深入阐述了他的保障底线公平的社会福利政策观，多年来他一直关注基于底线公平的社会福利政策导向，基于丰富的研究资料提出底线公平作为公平与发展相均衡的福利基点的重要论述。张妙清教授的论文“平等机会与发展：性别的角度”，运用经验数据分析了香港在教育机会、就业机会、收入获得、职业地位获得和向上流动机会的客观状况以及民众的主观看法，发现香港的性别机会不平等问题还不容轻忽，必须从法律和政策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和倡导，来促进机会分配的性别公平。

针对公平与发展的研讨，海峡两岸暨香港学者在许多方面达成共同的认识和理解，包括：公平的发展刻不容缓；不公平的原因是复杂的，经济成长机制、资本投入模式、产业分布及其转移、收入分配机制、相关公共政策、社会文化价值都是值得关注的；实现公平的发展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研讨会的召开和论文集的出版，对形成具有共识性的“公平与发展”华人学术理论、丰富实践经验具有重要价值。本论文集展现了海峡两岸暨香港学者研究公平与发展的学术前沿和最新成果。论坛长效机制的建立对海峡两岸暨香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展开更为精细和专业的学术合作提供了新平台和新契机。

目 录

主题演讲

中产阶层成长和橄榄型社会	李培林 / 3
平等机会与发展：性别的角度	张妙清 / 26
经济转型引发的台湾社会“不公平”	朱敬一 康廷岳 / 45

第一单元 公平与发展的内涵与关联

底线公平：公平与发展相均衡的福利基点	景天魁 / 63
公平与发展的哲学关联	苑举正 / 78
收入分配与公平发展的实现	范从来 张中锦 / 92
人类与动物平等关系初探 ——以辛格之动物解放伦理学为例	李凯恩 / 113
香港代际公平与发展	赵永佳 叶仲茵 / 125

第二单元 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与华人社会 实现公平与发展

公平的尺度：试论中华性与华人社会的共赢发展	吴小安 / 145
康德的“外在自由说”与华人社会的发展	杨祖汉 / 162
一般信任、发展与公平的内在联系	周 怡 / 177
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根基	胡水君 / 195

第三单元 海峡两岸暨香港实现公平与发展经验的 比较与启示

经济成长之外：台湾包容性发展的挑战	张玉芳	古允文 / 221
中国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城乡差异研究		
——基于 CGSS2008 数据	吴愈晓	黄超 / 239
内地经济发展为港台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民意角度的评析	郑宏泰	尹宝珊 / 260
公平的发展何以可能	肖巍	/ 286

主题演讲

中产阶层成长和橄榄型社会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

一 全面小康社会走向更加公平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目标，“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这虽然是个描述性的指标，实际上却涉及很多的指标，特别是中等收入相关的界定。什么是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有无可能？绝对贫困现象能否基本消除？以上问题都涉及约束性指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提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概念。尽管在社会学领域，“橄榄型”的概念已很常见，比如，对中国的描述，有“金字塔型”、“橄榄型”、“纺锤型”等很多描述收入分配结构形状的词语，但是橄榄型写进中央文件，还是第一次。怎么来界定橄榄型分配格局？

从中国国家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按照基尼系数测算，在改革开放的起点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其值略超 0.2，在全世界属于最平等的一类国家；发展到 2013 年，城乡居民家庭年人均收入基尼系数达 0.473。在基尼系数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初期的社会

共识是打破大锅饭，拉开收入差距，引进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时的政策就是拉开收入差距。小平同志说“要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且他认为这是带动全国的大政策，当时的拉开收入差距是在社会共识下形成的。

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 90 年代中期，即基尼系数第一次超过 0.4 的时候。按照当时学界的讨论，基本认为基尼系数位于 0.3 ~ 0.4 是比较合适的，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好。一旦超过 0.4，社会学界的很多文章就说超过警戒线，达到临界点。

但是，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中国改革的基本取向，他们认为收入差距大一些没有关系。而且经济学界比较深入人心的库兹涅茨的倒 U 型分配曲线假说认为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以后，差距会自动缩小。这是其他国家的路径经验。按照库兹涅茨的基本推论，发展初期资本和技术稀缺，所以比较昂贵；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以后，就会变成劳动力稀缺，劳动力价格上升，而资本和技术的价格相对便宜。因此，收入结构会自动调整。还有一种政治方面的解释，认为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劳动者在民主化过程中工资谈判的力量会越来越强，所以也会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扭转收入差距。总之，当时经济学界的普遍共识是改革开放打破了大锅饭，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有犹豫。不过，在社会学界，由于比较同情弱者，他们已经开始比较强调收入差距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触及临界点发生在 2000 年以后。原本根据预测，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收入差距会自动缩小，结果 2000 年以后，收入差距反而不断增大。这个时候的分析就多了起来，有些人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财富增长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库兹涅茨的倒 U 型曲线在中国的适用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财富增长，过去经由几代人才能打造成长为一个百万、千万富翁，而现在借助于虚拟经济和房地产，人们可以一夜暴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不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情况也类同，改变了以前的发展趋势。

2000 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了共识，争论集中在怎么缩小差距上，是采取一些政府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方式，还是更多依靠市场提高竞争能力、减少无序的差异。中国在 2008 年进入拐点，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8 年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

的最高点，大概是 0.491，接近 0.5。随后到 2013 年，五年间收入差距微弱缩小到 0.473。如果缩小的趋势能够继续，那么到 2020 年，中国能够出现库兹涅茨所描述的倒 U 型曲线。现在争论的问题在于：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能否继续？数据本身是否真实？现在的学界，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根据中国国内的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测算的基尼系数的结果要高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当然，学界的大调查数据都是回忆式的，调查时间到的是上年的收入各是多少。而统计局的数据产生是簿记制度，簿记制度比回忆更精确。但是统计局的弱点在于样本多年不变，抽样户固定，最富和最穷的是抽不到的，所以各有利弊。现在我们只能相信统计局的数据，所以现在就是看未来的趋势如何。

当然，现在对于趋势的描述有很多争论。新出版的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一书，其法文版和英文版，一直占据亚马逊图书榜的首位，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这本书很易读，原本在收入分配的描述中，统计的专业技能运用是比较多的，但是这本书没有用到高深的统计。这本书用了 300 年的数据，描述了一个大趋势：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而库兹涅茨的倒 U 型曲线，只不过是长周期中的一个偶然偏差，最终还是要回到长周期的差距上升的曲线上。虽然这本书被给予高度评价，但是社会科学所描述的轨迹，毕竟与自然科学的精确轨迹不同，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化，都将导致轨迹的不同，这个问题，仍处于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之中。

每个国家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都有所不同，就中国而言，结合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各种分析，意见比较一致的是，在解释基尼系数升高、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的时候，大概 60% 来自城乡和区域差异，而单单城乡差异一项，就占到总差距的 40%。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城乡差距的解释力比较大。当然，在现在的总趋势下，城乡和区域差距的解释力在弱化，而个体之间的差距的解释力在增长。城乡差距为何在中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呢？原因主要和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有关。

在当今的三大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中，农业产业增加值在 GDP 中只占到 10% 左右。但是，农业劳动力占到总劳动力人口的 34%，农民在城乡结构的占比将近 46%，而这还是剔除了农村富裕人口进城居住半年以上、算作城镇常住人口后得到的比例。也就是说，54% 的城市化水平并不完整，其中有相当比例是在城镇居住达到半年以

上的农村富裕人口。从三大结构来看，46%的农村居民，34%的农业劳动力，分享到的GDP蛋糕只有10%。

从这样的结构来看，农民属于低收入群体，单靠种地发家致富是极其困难的。我们曾经有过计算，欧洲农民并不是“穷人”的概念，一般都属于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而欧洲每个农户的平均可耕作土地为30~40公顷。比较而言，中国每个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只有0.5公顷。这还是全国的平均水平，如果剔除东北及中原的土地富余地区，南方地区的人均耕地只有几分地。一公顷约合15亩地，常言道人均一亩二分地，要在一亩二分地上创造致富的奇迹，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研讨会上，就开玩笑：让专门研究农业技术的专家亲自去种一亩二分地，即使再高的智商，种什么才能真正富裕起来呢？种水果、种草药或者花草，都不可能完全富裕起来。只有两样东西：一是种鸦片；二是种人民币。如果说到种人民币，那就是改变土地用途，农业用地要改成工业用地，工业用地改成商业用地，如果在土地上建造房屋，基本就跟种人民币的效果差不多了。地方财政的相当部分收入源自变更土地用途，所以各地都有变更土地用途的冲动。而现在不允许农民自行变更土地用途，必须经过国家征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政策有所松动，但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变更土地用途后的收入并不能全部回到农民手里。虽然都称作农民，但是在西方的称谓是farmers，一说到中国农民就是Chinese peasants。Peasants的准确翻译为“小农”，中国小农的称谓就说明了面积之狭小。在中国，要想整个改变城乡结构差异，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劳动力转移。而这也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现在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部分是非农收入。

关于收入分配本身，以前社会学界多数也讲，调整收入分配的初衷在于兼顾公平，社会公平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要保证一个社会的人们的基本权利，就要强调社会的公平价值。但是，单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强调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往往得不到经济学界的认可：效率和公平是不同的价值。以前的大锅饭过分强调公平不考虑效率也是不可取的，而现在，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影响到自身。

如果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应该使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更多依赖自身消费，而非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可是，消费的发展依然不尽如人意，收入分配对于消费有直接的影响。我们的调查发现，存在家庭的消费率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的规律，此处的消费率指的是消费占收入的比重。

越穷的家庭，其消费率越高；越富的家庭，其消费率越低。按照收入进行五等分，从最低的 20% 到最高的 20%，消费率递减。如果进行十等分，每一组各占 10%，收入最低的 10% 的家庭的消费率达到 98%。而收入最高的 10% 的群体，消费率则下降到 20% 多。收入差距扩大以后，尽管每年的居民收入增长很快，但是由于增长的比例过分向富人集中，就会出现富人由于消费饱和不花钱，穷人想消费而没有钱的情况，所以就会影响到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

恰恰在中国希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消费作为“三驾马车”中最有力的驱动工具期间，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2000~2011 年，中国消费率（消费总额占 GDP 比重）从 62.3% 下降到 49.1%，其中居民消费率从 46.4% 下降到 35.4%，远低于世界平均 70% 以上的水平。美国 3 亿多人一年消费 10 万多亿美元商品，欧盟 15 国消费 9 万亿美元，中国 13 亿多人只消费 2 万多亿美元商品。这也是中美关系的复杂之处：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国，但是生产的产品自己消费不了，只能往海外出售；美国是最大的市场，绝大多数商品都要销往美国。美国依赖中国的商品，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中国依赖美国，消化剩余产品。中美之间，既有尖锐的斗争，也有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当然，现在的奇怪之处在于，在美国购买的产品比在国内便宜，中国的游客在美国看到大车的商品被运到 Outlets，名牌产品比国内要便宜 1/3，其中的很多产品还产自中国，本国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却买不到。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消费没有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这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穷国的典型特征。比如，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是依靠自身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而中国过去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消费本身的力量相对薄弱。消费不振不完全是收入问题。现在的中国，已经不能完全说是个穷国，不是本国民众完全没有能力消费，也不完全是钱的问题，且不说将近 4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单从国内来讲，国家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1994~2012 年，税收总量从 5000 多亿元增加到 10 万多亿元，年均增长 18% 以上。这只是税收的统计口径，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增长达到 20% 以上，因为规费的增长比税收增长要快。这还不包括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大量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中国的政府很有钱，现行的预算体制，主要是项目预算，而财政制度是零余额制度，一到年底各大部委都发愁消化资金。所以看上去，国家很有钱，但这些钱花不出去。

可是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在逐级恶化，大约 2/3 的乡镇负债运行。特别是在落后地区，转移支付的是人头费，但是还雇用了很多的编制之外的人员，这些人员的供养资金没有财政拨款，就需要想方设法收取。为什么农村基层的干群关系紧张？因为取消农业税后，老百姓不满意政府还设各种名目收钱。关于财政，过去有句话：上面喜气洋洋，下面哭爹喊娘。但是最近一两年，上面也不再喜气洋洋了，财政增长下降得很厉害，2014 年首次出现个别月份财政收入的下降。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近几年来国家福利增长很快，需要大量的资金持续供应。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想：是不是中国的分配结构导致国富民穷呢？但是从统计数据看，老百姓也很有钱，居民储蓄也在快速增长。1994~2012 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 2 万多亿元增加到近 40 万亿元，年均增长 18% 以上，相当于当年 GDP 的约 75%。由于储蓄的增速快于 GDP 的增速，所以未来几年，储蓄将超过 GDP 总额。这笔钱怎么办？这是中国的特殊之处，一般国家的储蓄 = 收入 - 消费，余额用于储蓄再投资。但是，中国的银行中增加的居民储蓄总额大于“收入 - 消费”，其原因就在于相当部分为隐性收入，有说法是隐性收入占到 GDP 的 30%。打个比方，有人来调查你的月收入，工资条上有个数字，但是实际的收入远高于工资条的收入，而且实际收入能显示在银行的储蓄里。国家很希望老百姓的储蓄进入消费市场，实现消费对国家经济的拉动作用。其实国家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引导作用，银行的储蓄率一般不高于通货膨胀率（通过 CPI 度量）。比如说一年期的储蓄利率在 3% 左右，CPI 约为 2% 多一些，个别年份超过 3%，基本持平。但是，存到银行的资金，不能真正保值增值，要拿出来赶紧去花，可是老百姓是打死也不花。从北京的情况就能看到，一旦发行高于 4% 的国债，老大爷、老太太清晨六点就来排队，排着长长的队伍，国债发行很多时候不过三天便一抢而空。国债利率只比银行存款利率高一点而已，这在其他国家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其他的投资渠道不健全，老百姓总希望利息高一点算一点。实际上，老百姓不舍得花钱的真正原因，还是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普遍改善，家庭的不确定性风险反而更高。比如说一个家庭越来越不清楚，未来究竟要花掉多少钱。所以各大银行进行的有关储蓄目的的调查，连续多年的结果都相同：居民储蓄基本目的的排序中，第一位是子女教育；第二位是看病医疗；第三位是买房；第四位是养老。以子女教育为例，以前

很容易测算：四年大学，每年的学费 6000 元，加上一定量的生活费，存上 10 万块钱，四年足够。现在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如果出国留学，在美国一年的学费二十几万，加上生活费近 20 万，四年的大学基金至少要存上 150 万。还不知道毕业后有没有工作。家庭规避未来风险的意识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包括买房、养老、医疗等，都要存很多很多的钱。所以，消费不仅仅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不是说美国人的消费观就是信贷消费，这代人花下代人的钱，而中国人就是习惯存钱给下一代，其实是制度决定了家庭消费习惯的选择，因此要调整收入分配，不仅是改变消费习惯，还需要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配套。

在社会学界，关于调整中国的收入分配，学者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调整结果，还关注其对社会问题形成的影响。现在虽然没有文章直指收入差距扩大会带来怎样的社会问题，但是各种分析都表明，基层群众的不满是很明显的，特别是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后。社会经济地位认同调查分为五层：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在所做的调查中，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规律：人们主观上对于收入的感受和客观上的收入制度，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因果联系。比如，美国的收入差距大于法国，但是美国人自认为属于中层的比重要超过法国；巴西的收入差距高于日本，但是巴西人自认为属于中层的占比达到 57%。所有国家的经验都表明，不管客观上的收入是否平等，主观上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比例接近 60%。即使在一个不平等的制度下，通过教化、宣传等宣扬公平竞争的制度，也会让身处其中的人们认可自己所处的位置。他们不会将一切归咎于制度，而是从自身的教育水平、能力、技术等方面找主观差距，不会对制度产生不满。有学者写文章比较了北京和香港两个城市。两地的基尼系数接近，但是在香港，多数人认为收入低应该提高学历、提高能力，多加几份工，增加自己的收益。但是到了北京，就开始骂娘了，大家都认为自己所处的位置不应该是自己理应的位置，一切是由制度决定的。

2011 年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比例只有 44%，不足 50%，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或者下层。从这个结构上看，中国与印度的差距很大。印度的结构类似于国际通行的结构，尽管印度和中国在基尼系数上相差不多，其实印度贫富差距的对比要比中国更为鲜明，我们去新德里、孟买等城市的市中心，看到绵延几千米